



其后，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刘才赋的《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等，也都论及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是从“帮会史”角度开展研究的，但是他们所揭示的帮会与工运关系的成果，可以充分借鉴利用。

第四，我们已经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大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思想的禁锢，人为的禁区，只能将学术研究带入死胡同。不可否认，在研究中，人们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但只要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研究出来的东西能够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教训，那么，任何疑团都不难化解。

三、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评价

如果将日本人长野朗于 1925 年所著《支那劳动者及劳动运动》（北京燕尘社）视为最早的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专著的话，70 余年来，对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研究，尽管艰难曲折，仍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等人不但亲自领导工人运动，还撰写了不少足以指导当时、遗教后来的工运史论著。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遇到了很多干扰，工运史研究依然独树一帜，成果喜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刘明逵、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得以出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该书都引起了出版界、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工人运动史》凡六卷，洋洋 250 余万言。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这套书包含内容之丰富，是屈指可数的。同时，它大量运用第一手资料，充分吸收国内已有的工运史研究成果，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壮大、对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对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都做了清晰的、历史的叙述。它给人们的基本感觉有两点，一是自始至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突破了旧的框框，勇闯禁区，对许多有争议的人与事做了客观公正的论述。应该说，这套书将工运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对这套书做出全面具体的评价不是本文的旨趣，我们相信，有关专家和读者会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这里，只想就该书对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论述谈些看法。



列宁曾经指出，“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 and 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①。既然在历史上中国工人与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就不能回避它。本来，这个问题在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论著中并不避讳。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开篇就是讲“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行会、帮口、秘密结社诸问题。国民党工运史专家马超俊所著《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也用了相当篇幅叙述帮会对于工运的影响。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人出于政治压力，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使之进而成了研究的禁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在，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敢于突破禁区，对这个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这是值得称道的。书中对中国共产党排除困难，将工人运动与帮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有关论述，不但无损于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而且从深层次说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概括了中国工运不同于外国工运的特点，从新的角度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这正体现了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然，从书中叙述的有关内容来看，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该书第一卷第五章第二节“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用了43页（495～537页）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主要致力于“帮会”源流的叙述，而在帮会与工运的结合点上，却着墨不多；即使在有限的探讨帮会与工运关系的篇幅中，作者实际上引用的大多是后来的史料，与“早期”有冲突。据我们所知，“早期工人运动”一般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或五四运动以前，如何协调这种前后关系，值得注意。再比如，作者在上述第一卷有关章节中提出该问题，就有必要在其余各卷中适当穿插，而实际上却显很薄弱。此外，当时的其他政治派别，尤其是国民党，也十分注重利用帮会，帮会势力成了它们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一个得力工具。这一点，在书中似乎也未有很好的反映。

所以，我们认为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论述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够不够、深不深的问题。

顺便还应指出，从政治史研究角度而言，该书的成就值得肯定，但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来说，该书还有深入探索的必要。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勃兴，其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深远

^①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卷，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的影响，但在工运史研究领域，这种“影响”似乎既缓且微。如果继续用旧的眼光、旧的框架去研究工人运动史，就难以取得更多的突破。诚如刘大年所说：“现在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只是简单地重复原有的正确道理，就显得缺少了什么，不教人贻足。”^① 如何“整体”地再现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历史面貌，将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已成为工人运动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诚然，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若干时间以来国内外同类题目中一部值得注意的书”（刘大年语），在许多领域有所突破，但我们认为，作者们还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如工人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等。该书卷帙浩繁，但相当的篇幅在于描述政治背景，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决议等内容，在谈到工人运动本身时，多侧重于“过程”的描述。实际上，工人阶级的形象并不是单纯由“苦难—反抗”构成的。上引谢诺的著作，就专辟“社会与文化生活”一节，他说：“有些工人家庭尽管很穷，但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宗教习俗，观音像或其他杂糅不同教派教义的神像，被悬挂在主屋或仅有一间屋子的墙上。他们还非常热衷于在节日期间演京戏，舞狮子，耍龙灯。”^② 同样，上引裴宜理著作也辟有“民间文化”一节，对上海工人中的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烧香拜佛等行为做了研究。她提到，上海“许多丝厂女工都爱唱越剧”。对于工人中的结拜习俗，作者认为：“兄弟结拜、姊妹结拜与秘密结社有助于为这些如同无根浮萍的工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认同感。”^③ 确实，如果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他们的心态、价值取向、他们本身在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正反作用，等等，从而使工人运动史研究更加丰满，更加生动。一句话，工人运动史研究完全应该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开展研究。

总体来说，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一部成功之作，衷心希望她的作者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①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刘大年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②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 107.

③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pp. 187-188.